

經法戰利品

整風文件

(第一附冊)

淮南日報社印
一九四四年二月

目 錄

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
反對統一戰綫中的機會主義
列寧論羣衆觀點

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

譚政同志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報告

中央宣傳部
總政治部
通令
一九四四年四月廿日

一、譚政同志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在西北局高幹會上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是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問題的全面總結，其中關於發揚成績、糾正缺點部分及組織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軍、新四軍全體適用的；關於邊區經驗部分，亦值得全軍重視。八路軍、新四軍連級以上一切政治工作、軍事工作、後勤工作幹部，應一律將此文件作為整風文件與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討論，並須聯系實際，改造自己的思想與工作。對於文化程度低的幹部與全軍戰士，則應根據這一文件的精神與各部隊中存在的具體問題，編為通俗教材，進行普遍的教育與檢討。

二、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決了軍隊政治工作問題，而且也一般地解決了我黨歷史經驗、領導方法與工作風上的許多問題，為全黨幹部所應注意；同時，為了解黨的軍隊工作的方針，為了指導或協助各地軍隊工作，全黨幹部亦應研讀這個文件。

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的宣傳部與各軍區、軍分區及軍、師、旅的政治部，應負責組織這一學習。

四、各地應將此文件印成小本、廣為散發，直到連隊與區委。

一、關於邊區軍隊一年經驗的總結

一九四二年冬季西北中央局召集的高幹會及軍政幹部會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一九四三年的一年

，是邊區部隊大進步的一年。一年的時間，我們在邊區部隊內解決了一個重大原則性的問題——軍閥主義傾向與教條主義傾向的問題，確立了一個以西北局為首的，包括邊區黨政軍民在內的思想政治上組織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領導系統，並且發揚了蘇聯黨軍的優良傳統求得的領導作風。

還在前年高幹會時，我黨中央及西北局同志就指出：八路軍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是有革命優良傳統的軍隊，是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全國現存一部防禦最好的軍隊。而在抗日後邊區的八路軍，是在基本上完成了黨與上級給與他們的任務的，是執行了黨與上級的路綫的。但是同時又指出：我們的部隊出於種種原因，發生了一些傾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謂軍閥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傾向，犯這種毛病的程度各有差別的，而當前的任務則定一致起來糾正這種傾向，發揚優良作風，改變不良作風，以便更好地提高部隊的戰鬥力，更好地執行黨與上級的政治任務，更好地進行戰鬥、生產與羣衆工作，藉以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目的，推翻日本帝國主義。一年以來我們就是執行這個指示，並在基本上完成了指示所給予的任務的。

一年工作的結果，在軍黨關係上，軍政關係上，軍民關係上，官兵關係上，幹部上下級關係上，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關係上及各部分軍隊間的友好關係上，都有顯著的進步，這些都是軍閥主義傾向與教條主義傾向曾經藉以表現它的地方。在軍黨關係上（所謂軍黨關係，即是說我們的軍隊，必須完全的絕對的無條件的放在共產黨及其領導機關的政治指導之下，不能搞獨立性），我們不但建立了在邊區範圍內以西北局為中心，在各分區範圍內以地委為中心，同時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級關係的統一領導，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動步驟上，也趨於一致了。在軍隊與政府，軍隊與人民的關係上，經過擁護愛民運動與擁軍運動，特別是從一九四三年二月以來，軍隊方面堅決實行了自我批評，實行了坦白運動，將軍黨之間，軍政之間，軍民之間一切不良現象，都揭露出來，澈底改變了幹部與戰士的思想；對民衆關係不好者，實行改善關係，歸還借物，賠償損失，爭論事件錯在軍隊者實行向民衆賠禮道歉；軍隊又大規模地從事生產自給運動，改善了給養，減輕了民衆的負擔；軍隊又以大量的勞動力幫助民衆生產；這樣就使我們的軍政軍民關係大大的改善了。在軍隊內部關係上，無論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係，各部分軍隊之間的友好關係，凡屬存在着缺陷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邊區軍人坦白大會上，將官兵關係上，連隊生活上，個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現象，不滿心理，都講出來，

激發了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增進了親密友愛的空氣，糾正了各種不良現象，平復了不滿心理，團結了軍隊內部。所有這些方面，雖然至今仍然存留着若干缺點，並不能說已經完全克服，但和一年前比較，顯然是大不相同了。總而言之，部隊中多少存在着的以脫離羣衆爲其主要特點的軍閥主義傾向與教條主義傾向，是受到了嚴重的批判，是基本上被克服了。

在上述這些改造與進步的情形之下，部隊的情緒起了很大的變化，過去部隊中存在着若干消極情緒與不良行爲，現在一般均已消失，而爲新的情緒所代替了。現在的部隊，是充滿着戰鬥熱情、生產熱情與學習熱情的部隊，是富於朝氣的部隊。這種熱情與朝氣，從去年春季開始高漲，一直延續到現在。從去年的開荒、鋤草、秋收，往後又緊接着轉入整訓，中間經過七月間的戰鬥動員。其特點是：緊張性、普遍性與持久性。現在的部隊是充滿着進取心的。在生產中，在擁政愛民中，在冬季整訓中，都出現許多動人的事蹟，成批的勞動英雄與模範學習者出現了，許多的模範班排、模範連隊出現了。部隊的組織性與紀律性，是增強了。經過精簡改編之後，官多兵少，頭重腳輕的現象是被改變了，若干官兵脫節的現象是被克服了，違反紀律的現象也大大減少了。

在這個偉大的運動中，某些環節上的領導作風有了大的轉變，軍閥主義作風與教條主義作風都受到了批判。現在極大地發揚起來的作風，是聯系羣衆的作風，是實事求是的作風了。

所以我們說，去年一年是我們部隊的領導作風大進步的一年，由於有了這種進步，才獲得了去年一年真正偉大的成績，獲得了在我們部隊中實行整頓三風的成績，擁政愛民的成績，生產運動的成績，防止奸細的成績與冬季整訓的成績。如果沒有領導作風上的進步，這樣大的成績是不可能的。

陝甘寧邊區部隊的特點，就是它是後方留守的部隊。它守備了數百里河防，但因前方部隊的英勇作戰，敵人還不敢越河進攻。這些都是和前方部隊不同的。但其他一切則都大體相同。特別是在領導作風問題上，陝甘寧邊區部隊的進步，可以爲一切八路軍新四軍部隊所仿效。我們是怎樣取得這種進步的呢？

這種領導作風的進步，其過程是從實黨關係到軍政關係、軍民關係，從軍隊總的領導關係到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係，各部份軍隊之間的友好關係。以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而

論，又是從高級幹部到一般幹部，從幹部到士兵，從黨員到非黨員。如果去年的進步不是各方面的一系列列的進步，而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夫做；如果去年的進步不是首先抓住軍隊總的領導關係，亦即抓住高級領導幹部，使之打通自己的思想，改變自己的作風，無條件地服從黨的指導，作為推動一般幹部，影響士兵羣衆的前提，而是只從下級與士兵身上求解決；如果我們的同志在領導上確有毛病，而在檢討這些毛病時，却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不肯揭露自己的錯誤；那末，這種偉大的進步就將成為不可能，至少是不會有這樣大與這樣快的成績。去年一年的經驗證明，凡是依照這種精神與方法做去的，成績就很大，進步就很快。反之，成績就不大，進步就是很慢的。

去年的經驗證明，幹部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極其重要，也是極其艱巨的。幹部思想的進步是一切工作進步的樞紐，只有在幹部思想有了進步之後，工作的進步才是真正可靠的進步。而如若離開思想進步去求什麼工作上的進步，便必然只會是表面的與形式的。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變一切，這個真理，已為去年的經驗所完全證實。如果我們要從若干錯誤的領導作風變到正確的領導作風，要從軍閥主義偏向與教條主義偏向表現得最典型的部隊，在改變這種作風之後，就能飛躍地前進，要使落後份子改變為積極份子，要使自由主義的空氣改變為原則立場的空氣，要使不好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改變為好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如此等等，都是要從人們思想的進步才能進到行動的進步。差不多可以說，思想的進步過程，就是工作的進步過程，就是羣衆情緒的進步過程。那裏的思想改造做得愈徹底，那裏的工作，那裏的羣衆情緒，那裏的工作作風的進步也就愈徹底。

根據去年的經驗，使我們懂得，對於犯有錯誤的人們改造其思想，是應該有步驟的，大體上應該是：第一步，揭露錯誤；第二步，反省錯誤；第三步，改正錯誤。沒有前兩個步驟，就不可能實現後一個步驟。在一切存在着毛病的部隊中，三個步驟中，頭一個是首先重要的。沒有這個步驟，或這個步驟進行得不徹底，就是說，不揭露錯誤的本質，不對明明錯誤的東西進行認真的批評，就不能警覺幹部，就不能發動幹部對於檢討錯誤，批評錯誤的積極性。而對於犯錯誤的人來說，不揭露錯誤，就無法測知他對自己的錯誤的態度，就無法使他進行自我反省，即使反省，也會多是表面的，應付的，沒有下決心的，因而要他改正是不可能的。去年，邊區各地部隊曾經檢討過那裏的錯誤，檢討那裏的官兵關係與軍民關係，開過坦白大會，進行鬥爭反對軍閥主義偏向以及那種對於這個偏向採取痛不在乎的態度，即所謂自

由半壞的狀態，一次後有數好的又來第二次，第三次，最後果然是做好了。那些至今還沒有做好的，便是對於揭發錯誤做得不徹底，或做得不適當。

但是這裏所謂揭發錯誤，是有方針，並有其具體目標的，而不是輕率的隨意的指責。我們的方針就是教育幹部，改造幹部，就是教育士兵，改造士兵，而不是毀傷幹部，謾罵幹部，而不是毀傷士兵，謾罵士兵。只要犯錯誤的同志大膽地揭露自己的錯誤，誠懇地反省自己的錯誤，並有決心改正自己的錯誤，就不採取過火的鬥爭方法，不採取處罰與打擊的方法。在整個整風運動中，我們是執行了這個方針的，除了少數幾個真正的壞份子之外，對一切有毛病的同志，都是沒有執行紀律處分的。一時轉變不了的，在整風班及幹部隊慢慢進行整風。我們這樣做，是收到了效果的，大部份有毛病的人都轉變過來了，許多人並且轉變得很好。幹部中缺乏和奮鬥態度，缺乏勤勤懇懇教育士兵的態度，缺乏噤聲悶悶關心士兵生活的態度，缺乏關心民衆疾苦的態度，缺乏廉潔奉公態度的人，現在是改變了，學好了。幹部學好了，士兵也學好了。士兵中的二流子變爲好人了，想開小差的不開小差了，不滿的滿意了，破壞紀律的遵守紀律了，懶怠的勤勞了。總之，不論官兵，都面目一新了。這裏，我引一個邊區部隊中的典型例子來說明黨的這個方針的正確性。

下面是一個部隊的工作報告：

「思想上的轉變，可以部隊中積極份子的增多和落後份子的減少來說明。在去年三月剛整編時，黨員積極份子只有七十七人，非黨積極份子只有卅一人。而到去年十二月，黨員積極份子增加爲一百六十二人，非黨積極份子增加爲九十五人。剛整編時，黨員落後份子有五十五人，非黨落後份子有八十二人。去年十二月，黨員落後份子減少爲八人，非黨落後份子減少爲十五人。可見這個變化是很大的。」

「幹部中貪污浪費，私人做生意，只顧自己享受，不關心士兵生活的現象是被克服了。例如：一九四一年，那時採取了單純處罰的方法，對於犯貪污浪費等錯誤的幹部撤消了十多個，其中計有營長兩名，政教兩名，連長兩名，政指兩名，衛生隊長一名，民運幹事一名。但在一九四二年，同樣的不良現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多了。如果依然採取單純的處罰方法的話，那就要撤換更多的人，並且事情也一定不會變好。但在一九四三年，我們根據上級的指示，設止了單純處罰的方法，採取了改造思想的方法，一個人也沒有撤換。經過整風與反省，經過坦白大會，經過生產運動與練兵運動，過去犯錯誤的人

遂在這種偉大的運動中轉變過來了，還是這些人，但是一個整年中沒有發現一個再犯嚴重錯誤的人。上述的這個部隊，是邊區部隊中工作與紀律不好的部隊，這是極壞的典型。但因為揭發了錯誤，展開了羣衆的自我批評，改變了領導作風，提出了正確的積極任務，並且掌握了治病救人的方針，便很快的轉變過來了。至於大多數工作基礎好的或較好的部隊，一經按照正確方針認真整頓，其進步更是很快的。

由此可見，工作的做好，紀律的維持，是建立在領導正確與羣衆自覺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沒有領導正確這個條件，正如列寧所說：「整飭紀律的企圖，將不免流爲空談和虛妄。」而在領導正確這個條件一經獲得之後，就要着重羣衆的自覺；去年的經驗，也完全證明這一點。過去許多領導機關，對於幹部及羣衆中發生的消極現象，不去檢查領導，不去從轉變領導着手，不去掌握思想，不去從改造思想着手；並且對於犯錯誤的人們，不去從愛護觀點上去督促其反省與自覺，而只去用簡單的方式，實在說，是不正確的。因此，只有從愛護觀點出發，從揭露具體的錯誤到督促犯錯誤者（包括幹部與士兵）來反省自己的錯誤，勤勤懇懇地好心好意地推動他們自動的改正自己的錯誤，這樣一個路線，才是完全正確的路線。

這裏，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廢。但是批評是爲着啓發自我批評，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以批評的手段，達到自我批評的目的。在過去一個時期內，部隊中以改造思想爲目的的整風運動中，鬥爭目標，是集中在克服軍閥主義偏向與對於個人的自由主義態度上面，所謂揭露錯誤也就是揭露這些，這些目標以外的東西，只是聯系着它（可以聯系與需要聯系的），而不去強調它。不要企圖同時改正一切不良的東西，而應集中力量批判最主要的一點，其餘就會迎刃而解。在一定的鬥爭目標下，對於聯系具體的人一點來說，也只應該選擇典型，不應該採取平均主義。這種典型的批評方法與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與最有教育意義的正確方法；平均主義的批評方法與教育方法，則是最沒有力量，最沒有教育意義的錯誤方法。

去年一年，我們在部隊的實踐中，發揚了統一領導的思想，擁政愛民的思想，生產自給的思想，提高軍事技術的思想與防制奸細份子的思想，在這些思想的教育與實踐中，不但軍閥主義偏向受到了批評，教條主義偏向也就同時受到了批判。我們的軍政幹部，在進行工作時，已經能够不受教條主義作風所

束縛，拋棄了脫離實際，趨向空談；重視形式，輕視內容；團結少數，脫離多數的那些不良作風，而僅得了遇事從分析具體情況出發，並懂得了選擇典型與抓住典型的方法；懂得了不但要注意事件的形式，尤其要注意事件的内容；懂得了不但要照顧少數，尤其要照顧多數。在進行教育時，懂得採取啓發誘導與檢討反省的方法；懂得宣傳張治國的作風與門善德的作風；懂得組織張治國運動與門善德運動。這樣，就使得我們的教育工作，從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平均主義、孤立主義的束縛中；從脫離實際的抽象的概念中，解放出來。

去年一年的經驗使我們懂得，領導作風上的軍閥主義偏向與教條主義偏向，其共同結果，都是脫離羣衆，而教條主義則特別表現於脫離具體的實踐，而以抽象的空喊與形式的整齊爲滿足。反之，去年工作上所以取得偉大的成績，還因為我們在克服軍閥主義偏向之時，我們就使基本上克服了教條主義的領導方法，採取了我黨中央所指出的正確的領導方法。這種領導方法的主要特點，就是一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幹部與廣大羣衆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其具體指導相結合。每一運動，每一工作，都是先使組成領導核心的各級主要幹部先懂得，然後採取羣衆路線，通過羣衆，去進行思想動員與輿論動員，使一般幹部與廣大羣衆也懂得，然後才動手去做。在動員的過程中，都是根據各旅各團的情況去規定各旅各團的總計劃（一般號召），然後根據這種旅團的計劃及各單位的情況去更具體地規定班排連營的計劃，以至每一個人的計劃（具體指導）。在執行的過程中，又根據實踐經驗去修正這些計劃，並修正這些計劃，以黨爲了的減低些，低了的提高些（具體指導）。在動員過程中，又是使政治工作同志與軍事工作同志在使的統一領導下，在每一部隊中最有威信的首長的統一指導下，協同一致地去做，故無各自爲政之弊。去年許多大的工作，都採取了革命競賽的方式。但當羣衆的情緒還沒感覺到需要實行競賽的時候，就不應發動競賽。當這種競賽情緒在羣衆中醞釀到大體上成熟了的時機，便應立即號召競賽，並用一切力量組織這種競賽，這種時機成熟的標誌，就是不僅積極份子方面精神上更有充分準備，而且中間份子方面（他們往往佔多數）與落後份子方面，也已有了相當程度的準備，否則競賽便會變成少數人突出，只有少數人在做，不是多數人也能做起來的。去年生產運動開始時有些部隊發動競賽的時機選擇得不適當，發動過程，只看到少數積極份子的情緒，沒有照顧中間份子與落後份子的情緒，結果這種競賽的號召便落了空，後來照顧了中間份子與落後份子，重新組織競賽，便得到了成功。在生產運動與練兵運動中，凡

是不但照顧了中間份子，而且照顧了落後份子的，競賽熱情就愈奔騰，競賽規模愈弄愈大，一直堅持到底，完全成了羣衆自己的事業，不要領導方面的督促。我們必須懂得，在各種人們的覺悟程度上，中間份子比較積極份子是有距離的，落後份子比較中間份子又是有距離的，領導的任務，就是在於團結積極份子，吸引中間份子，鼓勵落後份子。而我們團結積極份子的全部目的，就是在於吸引中間份子與鼓勵落後份子一道兒前進。離開這個目的，積極份子就失去作用，我們組織積極份子的工作，就是多餘的事。因此，在任何一个帶羣衆性的運動中，在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上，在我們的組織步驟上，首要的問題，是照顧中間份子和落後份子的問題，要從中間份子甚至落後份子的水平出發，要選擇為中間份子與落後份子也能接受的組織形式與工作方法，要適應中間份子與落後份子的進度，而規定整個運動的進度。例如，我們在部隊的生產運動中組織張治國運動，郝樹才運動，胡青山運動，趙占奎運動（不是職工運動的趙占魁），武生華運動，馬振僧運動，馮國玉運動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為這支部隊中的先進戰士與先進的初級下級幹部，是本部隊生產運動或整訓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為本部隊戰士羣衆所熟知與親眼見到，容易吸引中間份子與鼓勵落後份子，容易為他們所理解。容易激起他們的上進心。因為羣衆是從自己的切身經驗來體會問題，不是從口號來體會問題的。如果我們的鼓動是脫離具體人物、具體事實的鼓動，便無法使羣衆了解，無法激起他們的上進心。但是當我們鼓動中間份子與落後份子向先進份子看齊時，必須不忘記中間份子與落後份子的特點。例如在生產的勞作形式上，必須依據體力強弱，並採取相當的自願原則，將勞動力劃分為甲乙丙三等，採取不同內容與不同程度的勞作形式，較之平均主義的與完全命令式的勞作形式，就會更為廣大羣衆所歡迎。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分別，我們就會要脫離羣衆。

在改造落後份子的工作中，主要應採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單純懲辦的方法。對於逃兵也不是單純懲辦方法才能解決問題的，必須採用教育感化方法，更要絕對禁止槍斃逃兵。在這裏，首長們從愛護觀點出發的親切談話是最有效力的，一定要把這種首長談話與羣衆中的自我檢討自我教育配合起來，才能發生更大的效力。單純的懲辦，甚至打罵的方法，只是一種脫離羣衆而毫無效果的方法。軍隊中一定要防止謾罵與肉刑，堅決執行一九二九年四軍古田會議的決議，一定要把從愛護觀點出發，從治病救人出發的勸懲懲惡好心的好意的教育感化工作，去代替謾罵與肉刑（打人），去代替單純的處罰方法，並且一定要把謾罵與肉刑以外的、必要的、按照事實情必不可少的正當處罰方法，也減少到最低限度。非在

十分必要的情形之下，決不輕易採用處罰方法。

一年的經驗是很多的。我在這裏講得很不完全，例如整頓三風，精兵簡政，擁政愛民，生產運動，總兵運動與防奸運動，均有各自的寶貴經驗，我在這裏沒有一一說到。我所指出的，只是一些共通的主要的經驗。並且也不是說，我們部隊的軍閥主義偏向與教條主義偏向，已經全部的與最後的克服了，不，不是這樣。我們部隊中存在的軍閥主義偏向只是受到了嚴重的批判，將它表現在軍黨關係，軍政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幹部上下級關係，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關係，以及各部份軍隊間友好關係上的顯著不良傾向加以克服，基本上改善了各種關係，並不是說這些關係已經完全的最後的改善。要使各種關係獲得更加完滿的改善，並使之鞏固起來，成爲根深蒂固堅強不拔的東西，我們還須繼續做很多的工作。至於愛好空談，脫離實際；重視形式，輕視內容；團結少數，脫離多數的教條主義作風，在過去一年中也是受到了批判的，但是還沒有全部克服，尤其是從歷史上檢討這個問題，過去我們還沒有做。下面我就想就全軍的歷史問題加以檢討，而着重於政治工作中教條主義作風與實事求是作風兩種作風的比較與分析，着重於政治工作中成績與缺點的比較與分析。至於軍事工作方面的教條主義偏向，這裏暫時不去提他。

二、關於發揚政治工作中的成績與糾正政治工作中的缺點

中國共產黨從它參加與領導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以來，從它參加與領導爲這個民族民主革命而戰的革命軍隊以來，就創設了並發展了軍隊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種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教育軍隊，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軍隊，使革命軍隊內部趨於一致，使革命軍隊與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趨於一致，使革命軍隊完全服從革命政黨的政治領導，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並進行瓦解敵軍、協和友軍的工作，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這就是我們的軍隊和其他軍隊的原則區別。我們說，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 political 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就是指這個意思。拿了這種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軍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軍隊的全部工作。北伐戰爭時期，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所指導的政治工作是這樣做的，國內戰爭時期與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在過去的紅軍中與現時的八路軍新四軍中所指導的政治工作，更是這樣做的。共產黨人在這三個時期的革命軍隊中所

做的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種保護人民利益的軍隊，如果我們不承認有共產黨領導，如朱德有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那是不可能設想的。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徹底保護人民利益的軍隊。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軍隊，就不可能是徹底保護人民利益的軍隊。八路軍初起事在抗日戰爭中，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堅持，艱苦奮鬥，再接再厲，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這裏。這種革命的軍政治工作，也不只是我們軍隊的政治工作人員做的，許多的軍事工作人員及其負責人員也參加了這種工作。同樣，許多的政治工作人員也參加了軍事工作。這在內戰時期是如此的，在抗戰時期也是如此的。

以內戰時期來說，我們軍隊在其初期是創造的時期，其後期是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時有其成績的時期，政治工作也有其創造，並且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時有其成績的情形。特別是在內戰初期與中期，在對敵鬥爭的政治工作上，在協助軍隊關係，軍隊關係，官兵關係，軍民關係，上下級關係，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關係，各部份軍隊間及對敵關係的政治工作上，總之，在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工作上是有其創造，以至於為今天這偉大的軍隊的一部分改良傳統。

以抗戰時期來說，其初期是主動積極的，是有偉大成績的，在這時期內，整個八路軍新四軍在黨的領導下，發展了抗日游擊戰爭，擴大了抗日武裝力量，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於自己的周圍，收復了廣大的失地，建立了許多抗日民主根據地，打擊了大軍的民族敵人，以至於能够協助處在四面敵地的國民黨軍隊停止了敵人的戰略進攻，保障了中華民族不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擊敗，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確的。在抗戰的中期，尤其是最近幾年，整個軍隊繼續執行黨的方針，與黨的許多具體政策，以至於能够打擊了日寇侵華軍隊的百分之五十八、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以至於能够破壞敵偽軍無數次的反覆的殘酷的「掃蕩」，能够有效地對付其殺光燒光搶光的所謂三光政策，能够使被敵人再度奪去的許多中國土地，又被我軍再度奪回來，能够忍受史無前例的沒有政府接濟，缺乏武器，缺乏彈藥，缺乏藥品，缺乏糧食被服的無限困苦，而為中華民族，為同盟各國，堅持了一條中國大陸上最重要最有力的抗日戰線，這些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確的。

總之，不論在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整個軍隊的成績是偉大的，軍隊政治工作的成績也是偉大的，軍隊中從事政治工作的人員，也和從事軍事工作的人員與從事後勤工作的人員一樣，他們是有功勞的，

分實際的一點點等。其思想，不是聯席地認真地把握些思想和政治工作的基本內容，而是把這些基本內容，基本方向，當作不甚重要的東西，却從形式方面重復了強調，許多不應該重復，不應該強調的東西。

這種作風發展下去，其結果勢必產生這樣的情形：爭取羣衆的任務有些被輕視了，軍隊的三大任務，三項紀律，八項注意，改變了提法，或被認為不必要了。軍隊內部團結一致的工作也有些放鬆了。黨政軍民關係也不去力求親密了。軍隊不尊重黨政，軍隊打罵民衆，侵犯民衆利益的現象，以及軍隊內部官兵對士兵的打罵現象，雖有指責，也不甚得力了。各部份軍隊之間的友好關係也減弱了，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在潛滋暗長了。由於山頭主義與本位主義的發展，軍隊的這一部份可以不照顧那一部份，主力部隊可以不照顧地方部隊與民兵。機範隊伍可以不照顧落後隊伍，從而在主力部隊的若干同志中（這裏軍事、政治、後勤三種工作同志都有），生長了一股驕氣，自以爲是，目空一切，只曉得成績，不曉得缺點，只愛聽恭維話，不愛聽批評話，懼怕別人批評，也懼怕作自我批評，有些則更發展到對黨與上級的領導機關獨立性的惡劣現象。所有這些情形，有些在抗戰時期有了改變，有些在抗戰時期先有發展，後有改變，有些則至今還沒有改變。

在黨內生活上，內戰後期曾經普遍採用了過火鬥爭的方針，缺乏嚴肅整後治病救人的精神。軍隊中的黨內生活，也發生過這種不正常的情形，以致許多不應該受打擊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打擊。抗戰時期，這種情形有了改變，但其殘餘沒有肅清，還發生過若干錯誤地打擊不應該受打擊的同志的情形。

在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係上，雖然基本上是團結的，但是存在過某些不協調的情形。在內戰後期曾經不適當地強調政治委員制度，不適當的強調政治工作的地位與權力，並且在實際上是，在不適當的強調所謂軍事工作人員與政治工作人員的黨性的差別，對於軍事工作者與政治工作者之間缺乏合作精神的提倡，是這種不協調情形的來源——但是這種不協調，不能一概責備政治工作人員方面，有些時候軍事工作人員主要負責任。

在抗戰初期，曾經一時遷就國民黨，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這是錯誤的。後來改正了，恢復了政治委員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還是很對的。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份革命軍隊中，都應有其適當的地位，都應適當地強調它的作用，否則這個部隊的工作就要受到損失。特別是在

那些政治工作比較薄弱的部隊，這樣的強調十分必要。對於政治工作地位的過分強調是不對的，但是沒有必要的強調，沒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對的。

整個軍隊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務，只能根據我軍的基本任務（爲反帝反封建而鬥爭，爲戰爭、生產與整黨工作而鬥爭）與當前具體任務（如反「掃蕩」、反謠言、生產運動、整訓運動、防止奸細、整頓三風、統一領導、精兵簡政、擁政愛民、改善軍黨、軍政、軍民、官兵、上下級、各部份軍隊之間的關係等，依當前需要而作具體佈置）去規定，不能在我軍基本任務與當前具體任務以外再有所謂政治工作的獨立任務。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軍隊，從思想上政治上與組織上去保證這些任務的完成。如果在這方面強調政治工作的獨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務與整個軍隊任務分離起來，那便是不對的，那便會產生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目標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脫離實際，顯得空虛的原因。任何組織形式，工作形式，工作方法，都是根據情況與任務而產生的，是從屬於一定情況與任務的，是應該依據情況與任務的變更而變更的，政治工作的組織形式，工作形式，工作方法也是如此。所以，如果離開軍隊的具體任務去談政治工作的組織形式，工作形式，工作方法，把組織形式，工作形式，工作方法與整個軍隊的具體任務相分離，並把它看成絕對的東西，那是不能不變成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東西的，在這個問題上，過去有些同志是認識不清楚的，如果現在還有這種情形，便應加以糾正。

應該指出，所有上述一切缺點，無論在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都不是一切部隊同樣具備的，其間輕重大小，互不相同，正如各部隊的優良成績，優良傳統，也各有特點，互不相同一樣。我們的軍隊始終是革命的軍隊，其有缺點，好似一個壯健的人有時生了一點病一樣，很快就會治好的。

還應指出，上述這些缺點，也不能認爲都是由於教條主義產生的，中國革命的特殊環境（小資產階級的廣大與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農村根據地）是其產生的客觀原因。教條主義思想的存在與沒有被肅清，我們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夠，則是其主觀的原因。一九四二年整頓三風以及實施各種改革以來，這些缺點就逐漸減輕了，某些整風深入的部隊，這些缺點就更少了。還應指出，軍隊中的教條主義，和內戰後期黨的領導上的教條主義，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沒有當時黨的領導上的教條主義，則軍隊是不會單獨產生這樣嚴重的教條主義的。

還應指出，當我們檢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時，不應着重在某些個別同志的責任，而應着重在總結歷史經驗，以爲今後工作的借鑑。還應知道，我們的軍隊工作與軍隊政治工作，總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的軍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與後勤工作同志的思想認識也是向前發展的，某些犯過錯誤的同志或是已經進步了，或是正在進步中，或是一經指出就可驅使之進步。根據中央慈前慈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我們應該團結一切從事軍事工作、政治工作與後勤工作的同志，不分彼此，共同工作。

但是應使我們的同志深覺認識，如果我們不從中國革命實際與中國革命軍隊的具體任務出發，如果我們犯了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毛病，我們就會無力以高壓的革命精神去教育軍隊，就會無力鞏固正當的軍黨關係、軍政關係，軍民關係與官兵關係，就會無力克服軍隊上下級之間，軍隊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之間，各部份軍隊之間以及軍隊與地方之間的不正常關係，也就會無力克服軍閥主義，本位主義、軍閥主義的惡劣傾向。反之，如果我們真正懂得了馬列主義的方法論，如果我們善於從中國革命實際與中國軍隊的具體任務出發，善於調查研究，善於聯系羣衆，那末，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後勤工作）的全般任務就能完成，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目的就能達到。中國革命的經驗，北伐戰爭、國內戰爭、抗日戰爭三個時期的經驗，都在證明這一論斷。

長期革命鬥爭的經驗證明，我們軍隊的任務，不是一個單純地對敵鬥爭的任務，四軍古田決議中已經明確的規定了這一點。由於我們軍隊的特殊環境，我們在內戰時期，曾經規定以作戰、籌款與做羣衆工作作爲軍隊的三大任務。自然，作戰是放在第一位，在戰爭時期，其他一切都是服從於戰爭的。但是，如果放棄後二項工作，就不適合於我們的環境。在內戰的初期與中期，我們軍隊曾經艱苦地但是光榮地執行了上述三大任務。這也就是說，在根據地沒有建立之前，曾經協同地方黨政建立根據地，而在根據地建立之後，又曾經協助地方黨政鞏固根據地。這樣的任務，就是在抗日戰爭中也是沒有改變的，大家知道，如果不是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華中協助當地人民，協助當地黨政建立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試問這樣強大的民族敵人（全部侵華敵軍的百分之五十八與全部偽軍的百分之九十，都担負在八路軍新四軍的身上），這樣長期艱苦的戰爭，怎能支持呢？不過在抗戰時期，籌款的方式改變了，我們提出了軍隊進行生產運動的任務，藉以改善軍隊生活與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負擔。於是我們八路軍新四軍今天的任務，就變成戰爭，生產與做羣衆工作這三大任務了。如果把這樣三個任務縮小成爲一個單純的作

敢任務，那就不能適合我們的特殊環境。

爲着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爲着實現軍隊的三大任務，過去軍隊的三項紀律，八項注意的精神必須恢復，軍黨之間、軍政之間、官兵之間、軍民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之間，以及各部分軍隊之間的關係，必須竭力改善，並建立在這固基礎之上。必須使八路軍新四軍一切部隊，無條件地服從共產黨中央及其代表機關的政治領導，才能使軍隊不走偏路，達到解放全國軍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

革命軍隊的內部，必須是團結的方針，必須是合作互助的方針，不能是分門別戶、各自爲政的方針，不能是互相輕視，互相妨礙的方針。凡屬革命軍隊，在黨的統一領導之下，軍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與後勤工作同志，除應強調專精自己本業，并指出如果小意本業則是不正確傾向這一點之外，還應提倡軍事工作與後勤工作同志應學習政治工作，參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同志則應學習軍事工作與後勤工作，並在需要他的時候準備去參加軍事工作與後勤工作，或竟改變現任工作職位去做軍事工作與後勤工作。而在軍事工作、後勤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係上，則應強調彼此的合作。不錯，這些工作各有其不同的內容，因此才分爲幾種工作；但是這些工作都是爲着團結自己戰勝敵人一個目的，這些工作的進行又必須取得和諧的合作。因此，凡是能鞏固這種合作的，即應受到讚揚，而如果是妨礙這種合作的，即應受到批評與指責。

在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總方針下，革命軍隊內部的爭論問題，只應該是思想傾向與政策方針的原則性的爭論，只應該是正確原則克服不正確原則的爭論，並且只是因爲這種爭論，是有助於鞏固黨的領導，鞏固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及其他各種關係，藉以提高軍隊的戰鬥力，藉以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目的。任何的爭論都應該完全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而如果是多少離開這種立場的爭論與對立，就都是無原則的，是不應該允許存在的。

在我們軍隊中，應該把尊重工農出身的幹部與尊重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尊重老幹部與尊重新幹部的方針，同時提了出來，並使這些幹部很好的結合起來。應該使人們懂得工農幹部的長處，我們軍隊中有大批的革命工農幹部，他們已在歷史上形成爲軍隊中一部份起主要領導作用的骨幹，正是我們軍隊的優點與特點（在黨務工作、政府工作、民衆工作中也是這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忠誠可靠的，並特